

釣魚城撫今追昔錄

方 豪

一 歷史美談

蒙古軍隊最早侵入四川，是在宋理宗紹定年間（一二三二—一二三三），此後四川即殘破不堪；到了端平二年（一二三五）蒙古大軍由太宗子闊端及將軍塔海等率領，三路圍攻四川；四川的爭奪戰，從此便到了最嚴重也是最後的一個階段。

淳祐元年（一二四一），余玠任四川安撫制置使，兼知重慶事；當時余玠幕中有播州（遵義府）冉雍冉璞兄弟二人，因余玠的殊禮優遇，又經過幾個月的考察設計，遂向余玠提議，將合州石照縣城移於州治東北的釣魚山上；冉氏兄弟以為釣魚山的形勢，在蜀口為第一，且遠在重慶之上。不過附帶有兩個條件：一、守城的人必須能盡職；二、必須積粟。余玠非常贊成他們兄弟二人的主張，立即秘密奏報朝廷，朝廷詔如所請，以璫為承事郎，權發遣合州；以璞為承務郎，權通判州事；徙城一事，完全由冉氏兄弟主持。淳祐三年（一二四三），他們三人便不顧任何人的反對，實行在釣魚山築城。這城到去年剛剛是滿了七百年。築城後十年（寶祐元年一二五三）余玠被讒，召赴臨安（杭州），未及啓行，暴卒。一說是服毒死的。

釣魚城築成後，有過一度最光榮的保衛戰，那便是建城後十七年，景定元年（一二六〇）元憲宗親自率兵來攻，自二月至七月不克，憲宗並在陣中受傷而死。關於這一段歷史，元史憲宗本紀和圖書集成職方典六一卷，重慶府都藝文一之三所載合州釣魚城記（作者佚名，新修合川縣志採入。）頗有出入。元史說那年四月「大雷雨幾二十日」；釣魚城記卻說：「自春至秋，半年無雨。」元史稱憲宗

「崩於釣魚山」；記文謂：「憲宗為峻風所震，因成疾，班師至愁軍山，病甚。……次過金劍山溫湯峽而崩。」元史說釣魚城守將是王堅，記文說是張珪。下面我們將略作考證。

在這一次戰事之前，短期的爭鬪也有過很多次。記文說：「其時北兵大營駐漢中利沔，初冬嚴寒，則來攻圍；春夏暄熱，則復退去。」不過那次憲宗親自率兵來攻，卻正是從春到秋，在氣候上說，對於北兵是最不利的；他是不是想利用天旱，逼迫城中人因水源涸竭而屈服投降呢？這是很可能的。如果那年四月真有大雷雨二十餘日，城中既不慮缺水，蒙古兵又何以不在炎熱的夏天北退呢？

憲宗攻釣魚城的時候，守城的主將是王堅，但張珪在當時是安撫副使，也就是王堅的助手，所以同在城中拒敵，記文說：「王堅去任之後，繼任乃安撫張珪也。……」似乎是說憲宗攻城的時候，王堅早已不在了。這是很大的錯誤。

至於憲宗死所，我們卻認為以記文所載為是。元史之所以要說「帝崩於釣魚山」，乃在自圓其說。因為上文既含含糊糊的說過：「留精兵三千守之」，彷彿已把釣魚城攻下；當然憲宗就非死於釣魚山不可了。

余玠在築城後十年被讒仰藥死；王堅雖抗敵有功，而且因元憲宗一死，南宋本有復興之望，但賈似道輩反屈膝請和，王堅非常失意，又受賈似道之忌，便在景定五年（一二六四）抑鬱而卒！

在王堅去世的前一年，張珪出知合州，事實上即是守釣魚城。咸淳三年（一二六七）張珪曾在江上與元將賽典赤奮戰，因為這一次戰役與釣魚城關係不深，所以本文不擬多說；張珪後於祥興元年（一二

七八)重慶淪陷時，被俘不屈，越二年，自縊死。但關於張珩的死，頗有異說，郭沫若(見下引文)已爲辨正，這裏亦不多說。

釣魚城的五位元勳：余玠、王堅、張珩都死得很可憐，冉氏兄弟，據說，亦未大用。遵義府志古蹟謂璣璣故居在今綏陽縣西南五里平木山。璣璣在縣之朗里，璣璣在縣之金里。可見二人是卒於家的。此外友人譚季龍兄所作播州楊保考(國立浙江大學史地雜誌第一卷第四期)據播州楊氏家傳，謂南宋末楊氏有裨將趙選趙寅，佐余玠禦元兵有功。二趙與二冉既同爲播州人，又同佐余玠，所以彼此之間，必有關係。不幸張珩的繼任人王立，因聽說重慶失守，張珩被俘，竟發生動搖；並受敵俘熊耳夫人的誘惑，以不忍生靈塗炭爲詞，於祥興二年(一二七九)正月辛酉(十三日)投降！又過了二十幾天(二月六日)，陸秀夫負宋帝昀蹈海死，宋亡。所以，釣魚城的命運是和宋室幾乎同時終結的，而宋室的末日，卻還在釣魚城投降後二十三天。

二 評介近人的兩篇文章

釣魚城以彈丸之地，與蒙古大軍對抗至數十年之久，這實在是我國民族抗戰史上輝煌燦爛的一頁。蒙古軍隊所向無敵，當時，他們的鐵騎已侵入歐洲，聲勢煥赫，不可一世，然而元憲宗蒙哥和他的大將汪德格卻都在釣魚城下受傷，不久即死。這對於蒙古雄師可以說是奇恥大辱，而在宋人這方面，真可以說是奇蹟。橫征數萬里的騎兵，面對着這一座小小山城，竟束手無策，望「城」興嘆，教後人怎麼不對之肅然起敬呢？

可是，在此次抗戰前，不但我們川省以外的人，很少知道釣魚城的壯烈故事，連川省文化人也有連釣魚城這個名字也不知道的(郭沫若自述，見下引文)。七百年後，蒙古人所不能征服的島夷，卻又向中國入寇，而入蜀避難的人中，自然也有不少愛好歷史的人，他們找到了一塊新舊地，發現了許多新材料，於是大談蜀錦、漢磚、崖墓以及夏禹王和李冰等等的遺事遺蹟，釣魚城當然也不例外。

關於釣魚城的文字，我看到了兩篇：一篇是鄧子琴的「南宋時代重慶在國防上之地位」，在責善半月刊第二卷第十五期發表(民國三十年十月十六日)；另一篇是郭沫若的「釣魚台訪古」，載在說文月刊第三卷第七期，即渝版第一號(民國三十一年八月十五日)。據朋友告訴我，前幾年出版的旅行雜誌中也有了一篇，是描寫釣魚城風景的，我找了很久也沒有找到。鄧君的文章祇根據正史和少數與地書的資料，略論南宋時四川的形勢(軍事與經濟)，又由四川縮小而說到重慶合川(釣魚城)兩城的險要，更由釣魚城的英勇抗戰而推論到它和宋朝國祚延長的關係。他引用的釣魚城記，是從縣志上抄來的，沒有依據圖書集成。對於釣魚城本身，祇略略提了幾句，除掉文獻上的記載以外，作者本人並沒有加以描寫，所以我揣測他並未到過釣魚城。鄧文對於元史和縣志，一併引用，但其中矛盾處卻並不指出；此外，還有一個極大的錯誤，是說：「崖山一役，而宋竟亡矣。宋社雖屋，其時川峽諸州郡，猶有孤立不拔，最後支持，以與元人相搏鬪者，則重慶合川兩處而已。」不知崖山一役，還在釣魚城投降之後呢(見前)！

至於郭沫若的文章，我讀完了後覺得很可引爲異的，就是無論在封面頁上或正文的標題，都是「釣魚台訪古」；我們知道浙江省富春江上是有「釣魚台」的，然而合川的「釣魚城」，卻從來沒有人稱它爲「台」。說是手民之誤吧，「台」「城」二字是不容易弄混的，況且郭君的文章，從頭到尾都稱「釣魚城」；但說是作者的筆誤，也未嘗不可。郭君很可能在寫文章的時候，由嘉陵江上的釣魚城，聯想到富春江上的釣台，因而也把題目寫錯了一個字。郭君之遊釣魚城，乃是應盧子英先生之約，「所以自重慶到釣魚山，一路的交通工具，食息招待，不但方便，更極舒服，在全篇文字中，很少見到他此行有舉步之勞；他的文章除引有幾段合川縣志外，還供給了我們幾塊碑文材料。可是除此以外，可作我們參考之處，似乎很少。最使我

來，友朋中去到釣魚城訪古的不下十餘人，也沒有一個能說得上城的大小。於是我決意自己去走一趟。

三 我的訪遊

四月四日，我從北碚乘字水輪到合川；次日到濮巖寺（即國立第二中學所在地）觀看唐代以來的雕刻；唐代的佛像，有些因石質不堅，有些因年代久遠，大部份已極模糊，少數比較完整的佛像，卻又被寺僧塗上惡俗不堪的顏色，無法見其真相；宋代石刻，保存的很多，唐代石刻卻已不多。這是一個小規模的千佛崖，據法國色伽蘭 Victor Segalen 所著「中國西部考古記」Premier Exposé des Resultats Archeologiques obtenus dans la Chine Occidentale par la Mission Gilbert de Voisins Jean Latrugue et Victor Segalen（馮承鈞譯）說：四川的唐代佛教石刻，是龍門唐派的流傳品（六十四頁）。色伽蘭等雖沒有到過合川，但我們一見濮巖寺的雕刻，也立即可以看出它的作風，是和龍門、雲岡的藝術，頗相類似的。最令人惋惜的是有幾處已被鑿成防空洞，遺跡宛在，佛容已杳。我國古蹟，被毀於無知愚民的，不在少數，但被毀於文化機關，倒還不多見，今竟不幸而見之於合川，真令人感慨萬千！

四月六日，我和二中王鶴軒先生及天主堂法國教士許維中司禱 Bouchut 一同渡船過江，這是東渡口，抵岸後，步行十二里，即登釣魚山，山頂為城，極險峻，城以完整巨石築成，至今七百年，但很少破壞。我最初以為城垣的遺址，或已不易辨認，所以歷來便沒有人去丈量；我到釣魚城第一件事，便是要確知它的大小。可是當時我心裏有兩個不同的意念：一個意念是認為丈量釣魚城並不費事，大約有一二十分鐘，即可繞行一周；一個意念是認為丈量或許不可能，因為如果找不到城址，便無法確知它的大小。當我走進第一座城門時，祇見城門左右各有數十丈完整的城垣，我於是決定用步行的方法，來丈

量城垣的完整部份；王鶴軒先生在合川已住了三四年，而且還在城下的教育館標本製造所任過事，他告訴我：沒有幾處城垣是完好的，坍塌的很多。然而初步踏勘的結果，即使我對於他的話懷疑，因為我已發現這座城，原來即不是連成一氣的；城址四周都是石巖，但如果你石巖本身即是削壁，而又有兩三丈高，那上面便沒有城垣，或祇堆列一些石塊，作為發炮射矢時隱身之用；其餘的地方便都是城垣。城垣的完整程度，總在百分之七十以上；我們如果用商業術語，很可以說它是七成新的。四川的石質大多是風化石，可是釣魚城的石塊卻是經過選擇的，風化石不多；坍塌的地方不是沒有，但我發現好幾處坍塌的原因，不是城垣本身不堅，而是城基的石巖崩裂；又因為幾乎整座城上都種上豆和麥（夏秋二季當然有其他的農作物），所以受農民人工破壞的地方，也可以多到百分之二十。農民怎麼會到城上去墾種呢？這也是別處沒有的情形。原來釣魚城裏的土地是和城平的，有些地方比城還高，所以田與城齊，地與城平；在山下仰看上去，是高中可擊的城，但一到城內，除了一些石欄杆，卻不見有城。

當我發現城的遺址，不難辨認之後，便將許王二君丟下，獨自一人，沿着城走去，口中默默數着步數，又根據手錶來計算時間；因為這是初步考察，帶些試探性質，所以一點工具也沒有拿。最初是不見一人，但見嘉陵江上帆影片片，我身如在雲外，不知高出江面幾百丈；江岸拉繮人短小如豆，不覺其在移動；偶聞一二鳥聲，稍破寂寞，惟蜂蝶隨處可遇，菜香亦不時撲鼻。忽見二壯年農夫，正在田間工作，相顧愕然，我即問城之大小，環遊一周，需若干時。二人面面相覷，瞠目不知所對，忽彼此作會心微笑，似覺此外省人之發問，何一奇至是！又似恍然大悟，一人嗚嗚言曰：「呵！走一圈怕得好大半天，走好大半天不是有二三十里嗎？」我聽說後，大喫一驚，其時才一點已過，再走兩三點鐘，不特吃飯成問題，即許王二君亦將急死回首而望，果見二君立於山頂，以手相招，依稀可辨，似欲我回去，我急返身前行，伴為不知。城既依山巖而築，故蜿蜒曲折，高下起

122054 伏，皆順山勢；城上或爲荊棘，或爲枯樹，或爲菜畦，或爲草叢，崎嶇不平，直無徑可行；二農夫既過，又不復見人影者久之，回首重望，許王二君亦不可再見矣。又久之，見一老僮，牧羊一小羣，問城之大小，曰：「大很！大很！城門都有三十六座哩！」我不覺又是一驚。私想如此大城，今日何能繞行一周？但欲返身回去，又覺半途而廢，着實可惜；我於是不顧一切，跟着城垣，一曲一折的走去，城爬到山上去，我也上去；在回顧無人的時候，我又突然遇到一位白髮樵夫，我還是問他城的大小，他答說：周圍有多大，我可不知道，從東到西，總有十幾里吧。仍是不得要領。只得再奔前程，心中是相當的焦急，但這是心理作用，完全是受了農夫和老嫗的話的影響。大約走了將近五十分鐘，我發覺我已漸漸從西端走到東端，並從正東而走向東南，我可以隱隱約約地望見渠河和涪河，現在卻又可望見碧油油的嘉陵江了。我心中已吁了一口氣，衣服早就脫了許多，我愈走愈興奮，但忽然有一家人家，建築在城上，無論如何也不能通過，三四條狗兇猛的追來，祇有這一處，我沒有沿城走，繞了一個小圈，這也是美中不足的地方。不久，我即見許王二君在山頭上，以手杖指東說西，他們等得不耐煩了！但釣魚城的謎——釣魚城的大小，總算被我揭穿了。它不像我當初想像中的小，也不像農夫老嫗們說的那麼大，我一共走了九千三百二十步，費時一點又十四分。我還得說明，我的步伐是相當小的，但我走路的速度，卻不太快，也不太慢。後來，我回到北碚，又特別到涪碚公路上，以同樣的速度，走了一點又十四分，結果是走了六公里半。現在我可以告訴讀者：釣魚城的周圍大約是六公里半，它比梵蒂岡城還大四分之一哩（梵蒂岡繞行一周，需時五十五分鐘）。

全城共有六門，每一城門都有一塊空白的橫額，大約因築城時間倉促，來不及題名。也許有兩處城門，是後來打通的，當時因恐許王二君迫不及待，竟或先行下山，豈不糟糕？所以無暇詳細考察。當

這也是他的心理作用。

郭沫若文中說：「山脚下有很多的稻田，山頂上也有很廣闊的旱地，糧食也不愁斷絕。不過在前據守的時候，秦蜀人相聚於此者十餘萬人，旱地恐怕都是人家吧。現在是一座人家都沒有了。」現在是一座人家都沒有，這就和事實不符了。大約郭沫若祇到了報國寺的一角，其實，據我所見到的，全城共有茅屋和瓦房十二幢，每一幢住幾戶，沒有調查；山背山坳恐怕還有我所沒有見到的。報國寺附近有保學（保國民小學），那天不知因為是春假，還是爲了音樂節，全校沒有一個人，但看那規模，怕至少有二十個左右學生；這所學校是專爲釣魚城兒童設立的，因爲山下還有其他小學。

四 當年守城時的兩大問題

講到釣魚城抗戰的史實，任何人都會注意到食糧和飲水問題。我們知道釣魚城自築城到投降共有三十七年，但戰爭的時間卻不很長，而且是常有間斷，比較長的一次，是開慶元年（一二五九）二月至七月的那一段，也不過五、六個月；據說城中共有十餘萬人，那一定是擁擠得很，恐怕可耕種的土地不會太多，所以全靠屯積的糧食；前面我們說過，從築城到發生最劇烈一次的包圍戰，相隔十七年，十七年的準備時期是相當充裕的。糧食一定積的相當多。況且在一座被困的城中，大家當然都能忍苦受飢，所以每個月每個月的食糧祇能以二市斗計，十萬人每月即需米二萬市石，六個月需米十二萬市石；就算一部份可以用雜糧代替，但雜糧的數字也必很可觀。釣魚城被圍六個月後，因元憲宗之死而解圍，這是出乎意料之外的；當初他們一定不祇是準備守六個月，就以一年來說吧，便需米二十餘萬市石，這數字究竟是很龐大的。所以食糧問題在當時如何解決，很值得我們詳細研究。

關於飲水的問題，郭沫若文中提到「傳說山上舊有九十二眼井，

寺中，也遇到一位盲目和尙，很喜於釣魚城掌故，他說：「舊有二十四井，現在都已封閉，目前祇靠一處泉水，水源並不很大，山上居民有時須到江中汲水。」這位和尙的話也祇能說明報國寺附近的一般情形，這一些地方，恐怕連他也模糊。至於九十二井之說，我想或者也像我遇見的那位老嫗，說釣魚城有三十六道城門，怕是過甚其詞，二十四井也許比較可信。報國寺門外，我曾發現一口大井，現在已經塞滿泥土，滴水不見了。

鄧子琴那篇文章中，對釣魚城雖絕少敘述，卻有一段很重要的紀載。據說：「山（釣魚山）南有大石平如砥，山上有天池，周五百餘步，大旱不涸。」可惜鄧君這一段文字，沒有註明出處，現在山上並沒有這樣一個大旱不涸的池。（水塘很多，卻都易於涸乾。）不過山上有天池是很可能的。原來釣魚城是因釣魚山而得名的，釣魚山一名魚山，魚山得名的來由，我尚未及深考，然而在對蒙古兵抗戰最艱苦的時候，釣魚城內還有重三十斤的鮮魚，卻是事實。請看下面一段文字：

「己未歲值大旱，自春至秋，半年無雨，北兵圍逼其城，意城中無水，急攻之。一旦至西門外，築台建橋樓，樓上接桅，欲觀城內之水有無。城內知其計，置砲於其所。次日憲宗親率其兵於下，廷（張珪）命城中取魚貳尾重三十斤者，蒸麵餅百數，俟緣桅者至，其竿木方欲舉，首發砲擊之，果將上桅人遠擲，身殞百步之外。即遣鮮活之魚及餅以贈，諱以書曰：『爾北兵可烹鮮食餅，再守十年，亦不可得也。』」（釣魚城記）

據此，則當時城中十餘萬人，半年不雨，如無久旱不涸之大池，決不能維持；再兄弟勸余玠築城的時候，祇請積粟，不愁無水，可知當時對於飲料必有辦法。但飲水或可取給於井，而三十斤巨魚則必蓄於池中，故當時釣魚城中有「天池」，很可相信，或許「釣魚」二字便是因「天池」而得名的。元史說那月四月大雷雨幾二十日，我前面已說明這話是不可靠的，元史不過要形容憲宗攻城的困難，或者把憲宗

的死，歸罪於氣候不良就是了。

四 餘論

郭沫若想把王堅和張珪的忠義，王立和熊耳夫人的奸詐，來構成一個劇本，這是我很贊成的，但幸而至今兩年，這劇本還未產生（鄧恭三兄告訴我，劇本已寫成，因故未出版）。我希望郭先生能再去釣魚城一次，把釣魚城四周的形勢，觀察得清楚些，這對於劇本的成功，一定很有裨益。中華教育電影製片廠最近正在籌備攝製史地教育影片，釣魚城的抗戰史蹟恰恰是一個好題材，而且有現成的劇景，所以我也希望來一個電影劇本。

我個人對於這次的考察，非常不滿意，希望在最近的將來，能邀得幾位同志，再去一次；我此次到釣魚城去，與其說是考察，實在不如說是遊覽，遊覽之始我也沒有打算記下來，不料四月七日回北碚，即覺左足背微痛，但一直到十三日，我還步行五六里路，到復旦去授課；那天下着牛毛细雨，山路泥濘不堪，我因不能再穿皮鞋，所以穿着布鞋到學校去，那情形是非常狼狽的；到了正午，突發劇痛，再也不能支持，同時體溫也在增高，不得已，便雇滑杆回寓，從此倒臥床上，非常無聊。一位探病的朋友，偏又笑我得不償失。我在床上也對自己說：這次既因訪釣魚城而得病，便來篇文字做做紀念吧！

（附記）除釣魚城以外，余玠還築有青居、大獲、雲頂、天生等十餘城。見宋史卷四一六余玠傳。道光江北廳志與地志古蹟十四「多功城」謂：「通志：在巴縣西，宋淳祐中築，今在廳西北。山石巖巖，因巖爲城，左高三丈餘，右文餘，週二百餘步，東西二門；創建年月無考，惟西門石上鐫『端明殿大學士、大中大夫、四川按察使朱繼孫建。』此則宋淳祐間築無疑。或謂與合川釣魚城同造，即保寧城也，然亦不可考。」以上幾座城，如果有機會的話，我還是想去看看的。

（補記）郭沫若所作「釣魚城訪古」一文，已編入三十三年十月出版之「今昔集」，標題業已更正。惟同集所收「題畫記」一文，有詩曰：「披圖忽驚悟，彷彿釣魚台。古木參天立，殘陽倚水開。蒙哥曾死去，張珪好歸來。戰士當年血，依稀石上苔。」這裏還是稱「釣魚台」，這是因爲作者用「千頭韻」台字。他又說：「釣魚城降元後，城於拆毀，但至今尙有殘蹟留存。西門一帶雖城樓已無蹤跡，而門洞無

恙。山頭除一寺一祠而外，全已化為田疇。」所謂「城被拆毀」，殊非真相，若欲訪求當年遺跡，則所謂「一寺一祠」，事實上也並不是當時遺物；若欲描寫現狀，則「一寺一祠而外」，實際還有其他民房，並未「全已化為田疇。」「釣魚城訪古」一文，作於三十一年七月十三日，「題畫記」作於同年八月六日，晚了二十四天，「題畫記」既稱「釣魚台」，那末說文雜的標題，恐不能說是出於一時筆誤。

附 明鄒智賊釣魚城志後

「予嘗觀天下之大勢矣：立國於北省，恃黃河之險；立國於南省，恃長江之險；而蜀實江之上游也。敵人有蜀，則舟師可自蜀浮江而下，而長江之險，敵人與我共之矣。由此言之：守江尤在於守蜀也。元南侵勿必自蜀始，豈非有見於此歟！再氏弟兄

湖游日記

迴雁館前路 春歸又一年

心傷芳草道 目斷碧雲天

舊國滄洲遠 他鄉歲月遷

故園何處是 雲水莽無邊

余於二十九年深秋，嘗泛舟瀟湘，南游長沙，然未幾即入蜀，未窮湘南之勝。三十三年三月，余有湘桂之行，以三月杪抵桂林，四月五日，又循湘桂鐵路，東之衡陽。久居巴蜀，山嶺阻塞，加以雨霧陰鬱，心滋不樂；今得一觀平陽，川原浩蕩，兼以風光明媚，天氣開朗，誠流寓中不可多得之暢游也。

四月五日下午，發自桂林南站，繞城西北駛，過招隱及西山三峯，皆數日前游覽所及。過桂林北站，稍停即開，羣山萬壑，直向東北，山勢漸趨渾厚，已非桂林山水可比。一小時三十分抵靈川，暮色蒼茫中到達興安。

興安當五嶺之西，處越城嶺之麓，臨湘瀾二水之源，為由楚入粵孔道。尤以湘瀾二水，南源分流，長江與珠江航運，賴以溝通，故自

受知余玠，而首畫城釣魚之策；王堅飛瑛，且戰且守，至死不降，豈非有見於此歟！向使無釣魚城，則無蜀久矣！無蜀則無江南久矣！宋之宗社，豈待嚴山而後亡哉；嗚呼！當茲城之成也，宋無西顧之憂，元無東下之險，使賈似道能用汪立信之策，陳宜中能用文天祥之策，下流與上游齊奮，內郡與外郡併力，天下事未可知也。天時不齊，人事非，令人有「古不平之憤！」（全蜀藝文志）

三十三年五月三十日修正

朱 傑

古即已著稱。水經卷三十八湘水條云：

湘水出零陵始安縣陽海山。

注云：

即陽朔山也。應邵曰：湘出零山，蓋山之殊名也。山在始安縣北，縣故零陵之南部也。魏咸熙二年，孫皓之甘露元年，立始安郡。湘瀾同源，分為二水：南為瀾水，北則湘川，東北流。羅君章湘中記曰：瀾水之出於陽朔，則觴為之；舟至洞庭，日月若出入於其中也。

又水經卷三十八瀾水條云：

瀾水亦出陽海山。

注云：

瀾水與湘水，出一山而分源也。湘瀾之間，陸地廣百餘步，謂之始安嶺，即越城嶺也。瀾水自嶺之陽南流注瀾，名曰始安水。故庚仲初之賦揚邵云：判五嶺而分流者也。湘瀾二水之間，有興安堤為之溝通，徐霞客至桂，嘗親臨考察，粵西